

回家过年

□张洛霞

“回家过年”是印在每一个中国人身上的烙印。每个人说起这句话时都有些自豪，因为，能回家过年，第一说明自己是健康的，第二说明自己是有家的。不管是父母的家，还是自己的家，总之有一个可以放松的地方。

每到大年初一，我总是抱着女儿坐在丈夫的自行车后座上回婆婆家过年。路上像我们这样的“三人行”比比皆是。男人们无一例外都是满面春风，一身新衣打扮，锃亮的皮鞋拼命地在车蹬上画着圆圈，车把上挂着的礼物如同马脖子上的铃铛。

那川流不息的自行车流就像缓缓的洛河水，把“一家三口”们平安地送到每个目的地。当时没有相机，那场景只印在我的脑海里，至今想起来都深

感亲切，挥之不去。

1990年1月，我到了日本。那年大年初一，我在南山大学上完课准备回家。当我走到L栋教学大楼时，突然听见一阵学生齐声念中文的声音。我情不自禁地停下脚步细听，一股暖流迅速传遍我的全身，我有一种回到母亲怀抱的感觉。当我稍停片刻，清楚自己身在日本不可能回家过年时，不禁百感交集，泪如雨下。

那声音是从L栋教学大楼地下一层传出来的。说来也巧，1999年，我从南山大学博士后课程毕业，在中京女子大学当了一名教员。南山大学当时正打算组建新的学科——外国语学部亚洲学科，请我担任亚洲科的代课教师。我欣然应允，而

我上课的教室正好是那个L栋教学大楼地下一层的教室。

直到现在，我每周一的中文课还是在那个教室上。虽然我已经没有了当时的激动，但每当走进那个教室时，我总是在想：会不会有人也像我当年那样，为从教室里飘出来的汉语而激动、流泪呢？于是，我总是要求学生念中文课时声音大一些。

自从1992年我和丈夫回家过了一次年之后，至今，我再也没有回中国过过年，我也不再说“回家过年”这句话了，因为每年的1月、2月是日本大学期末考试的时间，这种时候，如果不遇“婚丧嫁娶”之类的事，是不好意思张口请假的，但是，我好几次在梦中回家过年。

贴在岁月墙上的年画

□曹春雷

小时候，每次跟着娘赶年集，我总是拉着娘，先去卖年画的摊位。卖年画的摊位大都在集市边上，人流量较小。年画被摊主一张张挂在背后的墙上，或者摆在地上，有树的地方，就挂在两棵树中间扯起来的绳子上。远远看去，年画飘展在风中，花花绿绿，煞是好看。

站在年画摊前，手里攥着娘给的钱，眼睛总是不够用，看看这张，再看看那张，不知道买哪一张好。我特别喜欢风景画，那时憧憬着长大后当个旅行家，像徐霞客一样，走遍全国。我曾经买过黄果树瀑布、西湖、九寨沟、漓江的年画，这些年画，总让我有身临其境的感觉。

我将这些年画，一一贴在家里的土墙上。那时，我家的房子是几代人传下来的三间老房，土墙斑驳、黝黑，落满了岁月的尘土。贴上几张年画后，房间顿时显得与平常不一样起来，就像换了一个新家一样明亮，充满生机。晚上，我看着那些画入睡，梦到自己真的到了画上的地方。

从墙上揭下来的旧年画，我也舍不得丢掉，而是用来给新书包书皮，然后上面画上漂亮的图案，写上自己的名字。

对我的风景年画，娘不太感兴趣。她喜欢鸡啊、鱼啊、稻谷啊等图案喜庆的画，鸡和鱼象征大吉大利、年年有余，稻谷象征五谷丰登。娘说，贴上这个，日子会芝麻开花，节节高。

娘还喜欢买大胖娃娃年画，喜滋滋地买回去，贴在墙上，乐呵呵地看，还念叨着：“等你哥大学毕业，在城里结了婚，媳妇一定会给我生个这样的大胖娃娃。”那时，哥还在读高中，娘就迫不及待要抱孙子了。后来，哥大学毕业，果真娶了个城里姑娘，给娘生了个大胖孙子。娘看到孙子的第一眼，就惊叫道：和年画上的娃娃一模一样！

年画是人们的一个念想。邻居奎叔喜欢买有楼房的年画，贴在他黑漆漆的老屋里。他有三个虎头虎脑的儿子，长大后要是都在村里成家，他就要盖三套房子。奎叔有时为此叹气：“这三套房子盖起来，我的老命也该搭上了。”如今，他的三个儿子都长大成人，进了城，靠自己的努力住上了楼房。现在的奎叔，早已翻新了老房，成天乐呵呵的。

我年画里的那些梦想都实现了。大学毕业后，我留在了城里，年画里的那些风景区我也都去过了。当我站在真正的风景里时，小时候看年画的时光便在一瞬间呼啸着来到眼前。

如今，乡下的年集依然有卖年画的，不多，寥寥几家，摊前冷落，驻足者少。我每次赶年集，还是喜欢在卖年画的摊位前站一站，只为重温当年那些温暖的记忆。



火红的日子
苗青攝

故乡的年味

□王剑

腊月二十八一过，母亲就开始忙活了。

一年里节余下来的麦子都被磨成了面。母亲笑呵呵地说：“咱蒸几个豆馅儿馍吧！”我们那里多是山地，穷，一年到头吃红薯和玉米，吃得人嘴里寡淡得很。要是过年能吃上几个白面蒸的豆馅儿馍，那简直就是大典。

母亲开始动手做馅儿。馅料是我们家乡产的柿子皮和红豆。母亲把它们放在一个大锅里，煮、焖，然后拌成稀烂的紫泥。母亲手脚麻利地一通忙，一会儿工夫，豆馅儿馍就上笼了。灶台里的干柴噼里啪啦地响，锅里的水汽幸福地随风曳动。我们姊妹几个围在锅台边，盯着那些跳动的火苗，不住地咽口水。

终于揭开了锅盖，蒸汽扑面，笼罩了母亲的脸。母亲眯着眼，慢慢吹开那些蒸汽，用事先准备好的竹签，蘸上颜料，在胖乎乎的豆馅儿馍上一阵轻点。一朵朵梅花在水汽氤氲之中绽放。

母亲把豆馅儿馍分给我们每人半个。我们欢叫着跑开了。

母亲拿一把小铲子，拨开积雪，把地窖里的萝卜和葱拾进篮子里。葱和萝卜都沾着泥土的气息，腥腥的，有股春天的清香。

母亲坐在一个小矮凳上，细细地洗。腊月的寒风，狠狠地吹过，母亲通红的手，衬着萝卜的青、葱的黄，在我的眼里格外分明。

那年月，我们难得吃上一顿饺子。母亲想用她精巧的手艺，把这些素鲜的东西调出别样的滋味，好给惨淡的年味，添些迷人的向往。

煮、榨、剁。丁儿状的红白萝卜，掺上面酱、辣椒、茴香，在铁锅里不停地翻炒。香味迅速弥漫开来。于是，山村的夜晚在袅袅的酱香里，显得温暖而恬静。一年里所有的不安和忧愁，也都被这浓浓的年味挡在了外面。

母亲把红薯粉子倒在瓦盆里，用水和匀，然后抱来一捆劈柴。山区柴多，母亲一年四季烧柴做饭。

水开了，母亲把和好的粉汁徐徐倒进锅里，用小面杖慢慢地搅动。粉汁的颜色由浅而深，待变成青灰色时，火候就差不多了。

母亲把烧好的凉粉盛在一个个大碗里，冷成一只只粉团儿。粉团儿晶莹剔透，像硕大的玛瑙。待到吃时，把它们打碎，和野木耳、山野菜、萝卜丝、小菠菜一同烩汤，味道鲜美极了。

三大件做好时，母亲的年夜饭基本上备齐了。这时，外面的鞭炮声开始稀稀拉拉地响起来。新年大张旗鼓地降临了。

以上这些片断，是我每年都要给儿子讲的年关旧事。儿子听完，盯着我问：“爸爸，在老家和奶奶一起过年，真的这么有意思吗？”我看着儿子质疑的眼神，认真地点点头：“是的，儿子。年味都是有根的，它是爸爸永远的乡愁。几十年了，爸爸一直都没忘记！”

母亲今年八十三岁，儿子也已经十五岁了。这些年总被一些事情耽搁着，一直没带儿子回过老家。

看来，该回去一趟了！